

古小说与新材料

——从《太平广记》谈起

贾二强 李胜振

内容摘要:古代史研究,需要新材料,而新材料的获取,往往依赖于考古发现。本文认为,如能转变视角,对于已往不为人重视的传世非传统史料文献,进行深入开掘,善加利用,可以化旧为新,开拓出更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本文以《太平广记》为例,分析论述古小说类材料的撷取和使用方法,并提出采择这类材料研究史实的若干要点。

关键词:古小说 《太平广记》 志怪 史料应用

古代史研究,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久已为人重视,尤其是中古以前历史。近世学术大师王国维的一段论述常为人引用:“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学……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及汲冢所出”,再加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他指出:“惟此五者,分量最重,又为近三十年特有之发现,故比而述之。”^①另一位大师陈寅恪进一步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

前贤强调的新材料对于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已成为当今学人的共识。

①《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65-69页。

②《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新材料通常是指相对于传世文献而新出土新发现的材料,如先秦秦汉一般为甲骨文、简牍帛书等,魏晋至唐末五代则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新出墓志类石刻文献等,以及其他考古材料。其实,变换视角,传世文献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部分,如古小说,或可谓另类的“新”材料。

一、古小说的界定

小说其源甚古,《汉书艺文志·诸子》即载“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隋书经籍志·子部》有“小说家类”,后世诸家书目多仍之。明人胡应麟谓:“《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①即与杂家相类,同是讲述道理,然含有更多记事的成分。

《四库全书总目》云:“(小说家类)其来已久……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②部分地肯定了其所具有的价值。据此,将其分为三属:即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语之属。“杂事”近于笔记,与杂家类杂说之属相比,故事性较强。《提要》谓:“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③就是说比杂史更不成系统,更为次要,传闻色彩更浓。“异闻”一般是带有神怪性质之书,故事性强,神话色彩浓厚,如先秦的《山海经》、晋干宝《搜神记》、宋初官修《太平广记》等。“琐语”内容较杂,类于后代小品文,如题晋张华《博物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等,亦往往带有神怪色彩。

鲁迅认为实为两类:杂录类(即“杂事”),今习称为笔记、轶事;志怪类(含“异闻”、“琐语”),则神怪色彩较浓,即主要指《四库全书总目》所称的后二属^④。

鲁迅《古小说钩沉》为辑佚之作,所称古小说时间断限为先秦至隋代。而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则暂以五代为下限,宋以后之书置其外,又以之与宋以后的通俗小说相对而言,即唐五代以前的文言小说^⑤。这一分期,于作者虽有不得已而权宜为之的成分,对我们却有很大启发,本文以之作为古小说的下限的依据。这是因为,一般说来,古小说主要为研治文学者所关注,作为

①《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丙部·九流绪论下》,清光绪二十二年广雅书局刻本,第1页。

②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1182页。

③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小说家类二》,第1204页。

④参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⑤参见《古小说简目·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

史料类文献,利用则失之不足。特别是魏晋至五代的文言小说,尚有待于深入发掘其蕴涵的重要价值,使之补充传统的史料文献。而此后虽仍有文言小说,又有白话通俗小说,如话本、拟话本及章回小说之类,但由于宋代以下传世文献更为丰富,作为史料,其地位相对逊于上述古小说。

二、古小说史料的应用

以下以《太平广记》为例,重点谈谈古小说作为史料的应用问题。

《太平广记》是北宋初所谓奉诏撰集的官修四大书之一,共500卷,收录自汉至宋初的古小说400余种,其中约有半数今已亡佚。其内容丰富,前人早有定评,“盖小说家之渊海也”^①，“替我们留下古小说的林藪”^②。

《太平广记》在古代书目一般归于子部小说家类,如宋人编撰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題》就是如此。清代中期所编的古代图书目录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归于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从内容上看,《广记》广泛采择汉代到北宋初年的笔记杂记、小说野史等书中的材料,大多是讲说神仙鬼怪、奇事异闻、因果报应之类的故事,实质上是一部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由于形式上是分类编纂,也可视作一部大型古小说的分类汇编。

目前学术界对于该书的使用,主要集中于古代文学史方面,具体而言是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资料。实际上该书中有颇多内容可做史料使用,试举例而言。

(一)史事考索

治史者对古小说的利用起步并不晚,清中期学者徐松在《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中曾经留意利用若干唐人小说材料,但总体讲,还是比较有限,多用于对具体人物、地名等的考订。

业师黄永年先生(1925-2007)是现代学术界对古小说材料关注较早、创获颇丰的一位学者,他主要利用文献考订的方法从事具体史实的考证,研究内容和方法至今仍有启发性^③。

如对于胡汉关系的考察。陈寅恪先生提出唐人多将狐狸与胡人联系在一起,并敏锐地提出,这应反映唐人对胡人的某种认识。黄先生曾发表《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补论“狐”与“胡”之关系》,利用《太平广记》中时代更早的材料,如《幽明录》(《隋志》著录为“宋刘义庆

①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太平广记》条,第1212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国小说史略疏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

③贾二强:《黄永年先生与〈太平广记〉》,《国学茶座》总第十三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6-113页。

撰”)、《异苑》(《隋志》著录为“宋刘敬叔撰”)等为陈氏之说追寻更早的源头;又从《广记》中辑出更多唐代的资料加以申说,论证当时社会上对胡人的普遍认识,说明当时中外交往的一个真实方面^①。

又如关于佛教传播问题的考察。佛教就其影响之大之深,无疑是当今海内第一大宗教。这一局面何时形成,怎样形成及原因何在,尤其是从在民间的流传状况的角度,前人没有太多关注。黄先生主要利用《太平广记》中的相关故事,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佛教的宣传工作做得到家、深入人心,能够争取到广大下层民众的信奉,因此在唐代一举取得远远超越道教的位置,奠定了后世不可动摇的根基^②。

古代名物制度是读史治史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古小说在了解认识考订辨析古代、尤其是唐代名物方面,可以提供有用的材料。黄永年先生早年利用《太平广记》中的相关材料,在这方面也做了若干有益的探讨,譬如研究唐代多种明器的称谓等^③。

受先师的启发,我们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尝试。仅举一例:

唐中期裴度出将入相,是唐代头等大人物,与郭子仪齐名,号有再造唐室之功。据《旧唐书》的《文宗纪》和《裴度传》,以及《资治通鉴》记载,裴度卒于文宗开成四年(839)。《旧传》记其卒年75岁,则当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765);而据《新唐书·裴度传》其卒年为76岁,则生于广德二年甲辰(764)。二者孰是?

唐卢肇《逸史》载有一则具有浓厚神怪色彩的故事:

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及为相,机务繁冗,乃致遗忘,心恒不足,然未尝言之于人,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留之与语,曰:“公昔年尊敬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护不已,亦有感于相公。”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见形于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馀,北向而立。裴度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云无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④

命属某星与本命禁忌有关,为当时流行观念。这一观念的真正形成与盛行是

①《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73-85页。

②《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四册,第67-72页。

③详见黄永年:《茭蒲青果集》,中华书局,2012年。

④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〇七《神·裴度》条引,第2434页。按原书已佚。

在唐代,与佛教特别是密宗的传入及流布有着密切的关联。其说认为,人的出生之岁是与上天的星辰联系在一起的,即皆上应星宿,由此决定人一生的禀性命运。关于世人本命星的确定,据《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从斗杓数起,七星依次为贪狼星、巨门星、禄存星、文曲星、廉贞星、武曲星和破军星,一个往复恰为十二,也正合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当本命星相值之年出生者,皆可得到此星的庇护^①。裴度命属北斗廉贞星,依上述计法当辰,依《旧传》则为巳,属武曲星,错后一年,而《新传》正合,据此可正《旧传》之误。其生年有一年之差本无关紧要,但以此例结合时有其他两《唐书》记载违异之事,只要有他书可证,也往往为《旧唐书》误而《新唐书》是^②。由于学风的转变,在北宋前期,修史从此前的承用旧文改而为参稽考校纠正疏误而求其统一,可知后者撰修时应已尽量参用其他文献作了考订。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有歧异而再无其他文献可资佐证,选用《新唐书》或更近于是。

(二)民众思想观念

注目于古人的思想观念,会发现在历代人们往往容易只看见那些代表人类思想成就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一部部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主要由他们构成。但如果稍作思考,就会产生疑问:这些古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他们的思维水平,能否反映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同时代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芸芸大众的思想观念呢?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一般人恐怕更多的是投以敬畏而远之的目光,而对于他们竭精殚智的思虑之所得,大众们在忙碌于衣食之余,恐怕也没有多少精力去咀嚼消化。这当然并不是说普通民众在精神上一无所求,只是与大思想家的关注点未必重合,他们的需求,是在一个低得多的层次上展开的,而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生活需求,古往今来,从不怎么为人特别是学问家们所重视。这样,就产生了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到底如

①参见贾二强:《本命略说》,《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2期,第46-49页。

②如钱大昕考《旧唐书·孔戣传》载戣论进蚶菜事:“‘上(宪宗)谓裴度曰:‘常有上疏论南海进蚶菜者,词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访之,或曰祭酒孔戣常论此事,度征疏进之。’案:《新书》‘戣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淡菜、蚶蛤之属,戣以为自海抵京师,道路役凡四十三万人,奏罢之’,墓志亦云明州岁贡,独此云南海,盖史家因其为岭南节度使,妄益‘南海’字耳。此《新史》之胜于《旧》者。”(《廿二史考异》卷六〇《旧唐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68页)黄永年师辨《旧唐书》本纪之误,“僖宗广明元年黄巢攻占长安后,官军反扑,唐弘夫等曾一度突入长安,为黄巢歼灭,其事旧书本纪记于中和二年二月,宋(敏求)补《僖宗实录》、新书本纪则为中和元年四月(原注:《通鉴》从后者,见卷二五四并《考异》),今据当时身在长安的韦庄所写的《秦妇吟》,证实宋《录》和新书本纪是正确的。这类事例尚多,读本纪时必须注意”(《唐史史料学》《新唐书》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何,或者说他们的精神需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其实是过去(也包括今日与未来)影响和左右大多数人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是不应被漠视的。

而民间信仰正是下层人民精神需求的一个中心。研究古代的民间信仰,最感困难的莫过于系统的文献记载相对缺乏。所幸的是,自汉魏六朝以来,出自文士之手的小说层出不穷,保留下相当数量反映古人神鬼观念方面的可贵记述。特别是晋世以降,志怪小说的出现,更专以谈神说鬼为事,别开一番天地。文士们出于猎奇心理,或是作为消遣逞弄才情,往往将一些所谓奇闻怪事载入笔端。进入唐代,志怪小说更形繁荣,不仅保持着旧有的形式,而且还渗透到其他样式的小说品类之中。而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为了赢得尽可能广泛的信徒,也依据民间若有其事的传说,加工了大量关于自家以因果报应说为主的神异故事。大约从南北朝起,道教也不甘寂寞,编写了多种这方面的专书,同样有许多自神其教、神乎其神的神话。这类材料就主要保存在古小说中。

由于这类作品基本上是采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为蓝本,时至今日,留下一扇扇不可多得的探察那个时代民间观念的窗口。这些以往并不为思想史研究者重视的材料,其实可以作为认识下层民众思想观念的可贵源泉,通过其中所反映的民间传说,至少能够部分地恢复历史上民间信仰的本来面目。除了那些以志怪志异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小说作品外,由于文士们的乐此不疲,还有大量的类似记述散见于其时的笔记杂记中,用触目可见形容谅不为过。只要加以适当的分类排比,考订寻绎,对当时民间观念与信仰的考察,还是可以做到有迹可循的。兹举二例:

“华山信仰”的官民差异^①。岳神崇拜由来已久,先秦时代即可见诸侯国君祭祀泰山等当地名山的记载^②。东、西、南、北、中五岳观念,秦汉时即已形成。唐宋以降,五岳祭祀之事即成为定制,历朝历代帝王及官府祭祀之事不绝于史。起初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的盛典。唐玄宗朝,西岳华山的地位出现跃升,这与人为因素不无关系。史载“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③。

然而在唐代,民间的华山信仰,与帝王所封享有王号的一方岳神,又另具一副大不相同的面目,今传唐人笔记小说中载有多则其时民间流传的有关故事,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变化。关于华山神的故事里,有相当一部分将其描写成胡作非为的歹徒恶棍形象。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在此奇幻地交织相错,成为在古代同类信仰中极有典型性的一例。通过唐代关于华山神的各类

①详参贾二强:《论唐代的华山信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90-99页。

②《管子》卷一六《封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4-155页。

③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904页。

传说,可以看出与正式宗教大为不同的民间信仰的若干基本特征。

“禳丧与避杀”是一种古老的民间避忌观念。陕西关中某些农村地区,至今仍存在禳丧的习俗,死者出殡之前,为防止鬼魂入户扰害家人,守灵者夜间须由亲友陪伴,彻夜喧嚣玩闹。这一习俗观念渊源有自,唐皇甫氏《原化记》载: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炙,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则食之。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中,又使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齏噉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①

妨杀、杀鬼又名殃煞(或省称为杀、煞)等,《太平广记》有多则类似故事,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唐人的一则故事说:“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②可见这在古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观念,避杀流行于民间,是常有之事。徐绪至今,即为禳丧,其意识一脉相承,只是具体做法上有所改变而已。

三、采择古小说作史料使用时的要点

古小说文献作为史料,利用并不限于本文所述几点,近若干年来正逐渐得到治史者的关注,例如李季平、王洪军主编《太平广记社会史料集萃》^③,分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生活风俗、历史人物等大类;此前二人还合撰《〈太平广记〉社会史料初探》一文^④,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列举若干例

①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六三《妖怪·韦滂》条引,第2882-2883页。按原书已佚。

②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三三〇《鬼·僧仪光》条引《纪闻》,第2624页。

③齐鲁书社,1999年。

④《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第95-102页。

证,可以参看。

而采择古小说作为史料使用时应当注意如下的要点:

第一,由于材料本身的属性,古小说多具神怪色彩,研究问题不同,使用方法也应有所区别。一般而言,作为社会史史料相对较为直接,但要运用于具体史事的考释时,古小说史料则需要更为仔细的辨析和更加丰富的佐证;同时应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储备,以便对可能存在“冲突”的史料做出合理解释。此外有的语言为当时习语而后世罕用或不用,需要有正确理解。

第二,运用古小说史料的同时,要对传统正式史籍等文献有较好掌握,需要互相参证。二者关系类同于出土材料与传世史书的关系,二重证据法的原则同样适用。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入了解古小说这种非传统史料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三,注意区别时代,主要是作者生活时代。一般说不能有太大跨度,应与传统史料使用遵循同样的原始性原则。古小说上起魏晋,下至五代,同时又由于大量古小说已经亡佚,《太平广记》引用者即佚失过半,使用时需要弄清作者时代。

第四,需留意版本。小说家类之书,因前人多不够重视,不似经史典籍下过大功夫进行文字校勘,因此文本或有错误,如无可靠的整理本,则需要仔细勘校斟酌,尤其是其中关键性的文字。

材料的新与旧应相对而言,地下出土为新,但出土往往有偶然性,有时种类又较为单一,如近代以来地下出土较多的中古时期文献——墓志,具个人传记性质,应用起来存在局限。而传世文献,如能扩大视野,变换角度,深入开掘,认真提炼,一些从前不为人重视、未作为史料的材料,也可以做到化旧为新,点石为金。如能抱持客观而科学的态度,不仅仅古小说,许多其他往素不为人重的非传统史料也有可能或可以作为新材料进入治史范畴。

【作者简介】贾二强,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李胜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